

復興崗學報

民 94，85 期，1-24

中共新聞媒體在軍事事務變革中扮演的角色與作用

徐蕙萍

新聞學系

副教授

摘 要

面對世界軍事事務革命的新形勢，中國大陸亦積極推動其所謂的「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然而一向被視為共黨的喉舌、政治宣傳工具，並受到嚴密控制的新聞傳播媒體，適值此軍事事務變革的階段，在其間又扮演何種角色？中共又冀望其發揮何種作用？是值得探究的。經過本研究深入探究，中共軍方的新聞媒體在其所謂的「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中，除一貫的喉舌、共軍官兵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宣傳工具外，並成為信息化戰爭中的新作戰樣式。

關鍵詞：軍事事務革命、新聞體制、軍事新聞政策、軍事宣傳

壹、前言

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一詞¹，是羅伯茨(Michael Roberts)在1955年首次提出「軍事革命」的概念，自此之後，此概念就被西方人普遍採用。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後，美國學界與軍界開始對軍事事務革命投入極大的心力，並積極的展開研究。

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²被視為是信息軍事革命到來的標誌。因為這場戰爭，讓世人見識到戰爭已由「尖端科技」與「訊息」所主導，美國等西方國家已將軍事科技、軍事組織、武器裝備、作戰準則、後勤管理技術等重新整合，使之發揮最大、最科學的能量與效能，世界各國因而展開對軍事事務革命的關注與變革；中國大陸當然亦不例外。此可由中共2002年的《國防白皮書》，在其〈安全形勢〉章節中指出：「世界軍事變革迅猛發展，軍事力量對比出現新的嚴重失衡。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在軍事領域廣泛應用，戰場向陸、海、空、天、電多維空間擴展，中、遠程精確打擊成為重要作戰樣式，戰爭形態正在向信息化方向發展」（吳恆宇，2004：52）。

共軍總參謀長傅全有亦指出，「迎接世界軍事發展的挑戰，…。隨著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並廣泛運用於軍事領域，未來戰爭中的高科技含量越來越大」（《求是》，1998/3）。面對世界軍事事務革命的新形勢，已美其名為所謂的「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但中共亦坦承，其與美國等軍事強國相較，仍有一定的軍力差距。所以在新軍事革命方面，更要大力依靠科技的進步，以提高其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水平（金鑫、徐曉萍，2002：220）；足資證明。

這次全球性的軍事革命，具有五大特徵：（一）武器裝備智能化：其具體表現為各類精確制導武器成為戰爭的主角，也就是精確制導武器佔戰爭投射彈藥總量的比例明顯增加；（二）軍隊體制編制精幹化：其具體表現為軍隊減少數量、提高質量，也就是「從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從人數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三）指揮控制自動化：是利用數字（位）技術，以計算機系統作為戰爭的神經中樞，對戰爭進行的指揮控制；（四）作戰空間多維化：是突破過去傳統的陸、海、空三度作戰空間，擴展到陸、海、空、太空以及電磁的五維空間；

¹ 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一詞，是西方大多數國家對軍事變革的稱呼。中共稱「新軍事革命」，「新軍事變革」，或「有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吳恆宇，2004：6）。

² 對於波斯灣戰爭，中共是將之稱為「海灣戰爭」，文中除引述其原文外，皆以我們習用之「波灣戰爭」稱之。

(五)作戰樣式體系化：是指作戰模式已經從過去單一軍兵種的作戰，發展到包括空地一體戰、空地海天一體戰、和各軍兵種的協同作戰等(吳恆宇，2004:23)。易言之，高科技、高新技術的運用，為這次全球性軍事革命的核心。

基於要積極推動軍事事務革新，而這又必須依靠高科技、高新技術，故「科技強軍」是現階段中共軍事發展的重心。

一向被視為共黨的喉舌、政治宣傳工具，並受到嚴密控制的新聞傳播媒體，適值此軍事事務變革的階段，在其間扮演何種角色？中共又冀望其發揮何種作用？是值得探究的。又適值中共強調要對我展開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所謂的「三戰」之際，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一探中共新聞媒體在軍事事務變革中扮演的角色與作用，是兼具學術與實用性的。更何況，目前相關研究仍付之闕如的狀況下，愈突顯本研究的意義；在本文中將以文獻分析法針對上述問題一一探究之。

貳、中共新聞傳播觀及其在軍事上的運用

一、中共的新聞傳播觀

中共高層堅信：「建立政權和鞏固政權靠的是兩桿子：一是槍桿子，一是筆桿子（主要為宣傳媒介）」（何舟，1993：94）。共產黨人之所以如此重視新聞傳播媒體，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共產革命之經驗，二是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首就共產革命之經驗來說，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幾乎所有重要的共產主義運動領袖，都曾從事過報業或宣傳工作，這些個人直接經歷，以及傳媒在革命期間對思想趨於簡單之民眾所起的明顯煽動和組織作用，甚至對其敵方所起的攻擊作用，無疑的，這一切均使共產革命領袖們從實踐上意識到傳媒的重要性（何舟，1993：96）。至於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則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及毛澤東等人在新聞傳播方面的論述，後由鄧小平、胡耀邦、江澤民等人再作闡述、豐富之。若仔細審視中共的新聞傳播觀，擇其要者，不外乎下列四項，分述如下：

(一)喉舌、工具論

中共承襲馬克思主義關於新聞傳播的「工具論」。馬克思認為新聞傳播也像其他國家機器一樣，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此在1928年的「共產國際綱領」中即明確規定：「新聞出版業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工具之一」。列寧也多次強調，「報紙是黨和蘇維埃政權中的集體組織者，是建立與勞動群眾聯繫並把它們團結在黨和蘇維埃政權周圍的手段」。

這種「工具論」，經過毛澤東、鄧小平等的詮釋下已成為「喉舌論」。即便

在中共高層領導中屬較開明者，如前總書記胡耀邦，亦不例外（何舟，1993：95）；胡耀邦於1985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中，甚至進一步將新聞傳播活動的性質和地位作了清楚的界定。他明確指出，「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自然也是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時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胡耀邦，1985：1）。1989年11月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亦一再重申此「喉舌論、工具論」，他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歷來非常重視新聞工作，始終認為，國家的報紙、電台、電視台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11/30）。

按照中共「喉舌論、工具論」的邏輯，黨的喉舌就是人民的喉舌，因此，人民不需要、不必要，也不能夠擁有自己的喉舌（新聞傳播媒體），這也充分顯示中共獨占新聞媒體，把它作為鞏固其統治的用心（何川，1994：45）。

也就由於在中共統治下，新聞傳播媒體淪為共黨的統治工具，其非但無法像自由民主國家的新聞媒體那樣扮演輿論監督的角色，亦較難發揮猶如自由主義新聞體制下傳播媒體應有的守望環境、協調統合的功能、傳衍文化的功能及娛樂的功能（林東泰，1999）。

（二）黨性原則

基於報業等新聞傳播媒體被中共定位為「工具」，是中共的「喉舌」，造成其主要功能亦被界定為「宣傳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政治服務」（毛澤東，1990）。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則明白表示，「新聞工作是黨的整個事業的一部分，必須堅持黨性原則」（江澤民，1990：189）。

所謂「黨性原則」，依照中共的說法就是新聞傳播活動必須在政治上和共黨中央保持一致，在組織上無條件地接受黨委的領導，遵守共黨的紀律，一切重大宣傳方針都必須向黨委請示和事後向黨委匯報，所有新聞媒體的重要言論要經過黨委集體討論，各新聞單位必須遵守「不得自以為是，不得發表與共黨中央決定相反的言論」的規定，否則將遭到查封、停刊的命運（何川，1994：46；盛沛林主編，2000：220；邵培仁、陳兵，2003：18）。

事實上，這所謂的「黨性原則」，一言以蔽之，即在鞏固政權為前提下，不但新聞傳播媒體本身必須接受共黨的領導，增強所謂的黨性，甚至於其刊載的內容完全得根據政治的需要進行變化或修改，但亦使得報紙等新聞媒體皆以「對共黨的方針政策宣傳有利與否」為新聞取捨之衡量標準；凡是對共黨的方針政策有利的，就是最大的新聞，就要連篇累牘地大肆宣傳，否則再大的新聞事件也可以壓下來不報或晚報（邵培仁、陳兵，2003：16；何川，1994：41）。無怪乎，中國大陸的學者甘惜芬對於其報紙長期以來的現象，也不禁搖頭嘆息；他曾在《上海經濟導報》，發表〈多種聲音，一個方向〉專文中，對中共報紙有所評價，略述如下（徐蕙萍，1989）：

- 1.是迫切需要瞭解的新聞不多，而不感興趣的新聞太多；
- 2.是不把真相告訴人民；
- 3.是對領導人一味歌功頌德，沒有輿論監督；
- 4.是不敢大膽批評時弊，繞著矛盾走；
- 5.是不能代表人民向國際發言；
- 6.是沒有新聞自由，沒有與官方不同的意見；

上述的評價，雖然是中國人民大學甘惜芬教授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所發表的觀感；然審視當前的中國大陸報業等新聞媒體，即便經改已令其有不少的變化（徐蕙萍，2004：175），但在這所謂的「黨性原則」下，仍較難發揮猶如自由主義新聞體制下傳播媒體應有的輿論監督的天職。

（三）輿論導向的灌輸性

誠如上述，在中共眼中，新聞傳播媒體的主要功能就是宣傳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為政治服務的。換言之，在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媒體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宣傳、灌輸共黨的意識型態為目的。事實上，早在一九四八年，毛澤東就強調：「黨報的基本任務是正確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教育群眾，讓群眾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務以及黨的政策」（毛澤東，1990：71）。

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在中共嚴密掌控下，關於新聞媒體報導的方向及內容，都是由中共中央來決定，此即中共所謂的「輿論導向」（何川，1994：108）。具體而言，中共所要求的「輿論導向」，必須依照中共的價值標準來影響傳播方向，這個價值標準就是共黨的意識型態及其方針、政策（何川，1994：87）。事實上，中共也明白表示，其「強調輿論導向的目的，即在於希望各種非主流的思想觀念，以及其他一些屬於主流思想的形式不一的思想觀念，能夠同現實的意識型態協調，趨向於它」，中共甚至毫不避諱地指出，「至少不要影響現實意識型態對全局的控制，以保持社會的穩定」（陳力丹，1999：27）。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亦明白指出：「歷史經驗反覆証明，輿論導向正確與否，對於我們黨的成長壯大，對於人民政權的建立、鞏固，對於人民的團結和國家的繁榮富強，具有重要的作用。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人民日報》，1996/9/27）。

中共通過對新聞媒體運作的控制，使輿論導向循著其所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及其政治的需要發展，這種以灌輸為目的的宣傳觀，一直被中共貫徹實施中。

（四）正面宣傳的原則

論及新聞，新聞從業人員每天採訪新聞、編輯新聞，對於新聞每個人的定義不盡相同。一般而言，新聞媒體較偏重於時效性(timeliness)、接近性(proximity)、顯著突出(prominence)、後果(consequences)等作為選擇新聞的標準。若由

媒體組織觀點而言，新聞是知識產品也是經濟產品，新聞必須符合企業目標，來自企業內部的控制很難避免，而新聞媒體也必須與其他政經團體互動。再者，新聞除了是企業成品外，更是新聞人員綜合其專業素養與人生歷練的文化產物（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編，1999：209）。

基於此，雖然客觀、準確與平衡公正是新聞品質的主要象徵，但經過層層的產製與守門過程，新聞實在很難達成絕對客觀與公正（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編，1999：210），則是不爭的事實。不過，新聞的真實性則是新聞理論和新聞實踐的一個基本問題，新聞的價值、規律和功能都是以真實性為基礎。報導不真實，新聞就不成為新聞，新聞媒體亦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但是在中共的新聞政策中卻強調真實性要服從於黨性和階級性。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亦明白指出：「我們所說的新聞的真實性，同新聞工作的階級性是一致的」（江澤民，1990：190）。易言之，在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所刊載的新聞，真實性並非首要，一切都必須服從於黨性和階級性，也就是所謂的新聞要為政治服務。

基於此，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必須遵循的一條極為重要的方針。依據中共的說法，「所謂堅持正面的宣傳，就是要準確、及時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實事求是地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主流，讓人民群眾創造新生活的業績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們前進的巨大精神力量」（李瑞環，1990，201）。若檢視中共建政以來新聞傳播媒體所謂的堅持正面宣傳，簡言之，就是「報喜不報憂」。中共對此不但在理論上有系統的闡述，甚至已形成一整套指導新聞媒體運作的原則與規範。特別是在其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大陸所有報紙、電台都充斥著「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來越好」的所謂「浮誇新聞」（何川，1994：43）。至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中共對正面報導制定了嚴格的限制，規定：歌誦社會主義優越性和光明面的報導，與批評社會主義缺點和陰暗面報導的比例為八二開，此即所謂的八二開的「計劃新聞」。事實上，此為胡耀邦於1985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時規範的，胡耀邦指出：「因為社會主義的主導方面是光明的，同時也存在著黑暗面，所以報紙上，大體是八分講成績、講光明，二分講缺點、講陰暗面、稿批評。即使是陰暗面，也要注意態度問題，一定要指出我們有信心消滅它」（胡耀邦，1990：288）。

新聞報導若「報喜不報憂」，即使沒有虛構，亦非真實的；因為新聞，只是正面報導，反映的亦不是社會真實的現實，中共此種「以正面報導的宣傳方針」，肇致的結果則是「弄虛造假」、「浮誇新聞」充斥於媒體。

綜上所述可知，也就因為中共的新聞傳播只是為了宣傳，其傳播導向就是以灌輸共黨的意識型態為目的。這也就造成其傳播媒體所刊載的新聞，僅為社會化

的過程，不但毫無「客觀」可言（張多馬，1995：32），甚至在其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新聞方針下，新聞報導只「報喜不報憂」，造成「弄虛造假」、「浮誇新聞」充斥於媒體。這一切都是中共新聞傳播觀及其衍生的新聞政策所肇致的。只要中共新聞為政治服務的信條存在一天，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媒體就無法改變這種「弄虛造假」、「浮誇新聞」充斥於媒體的狀況。當然為共黨鞏固政權的工具性角色亦始終無法擺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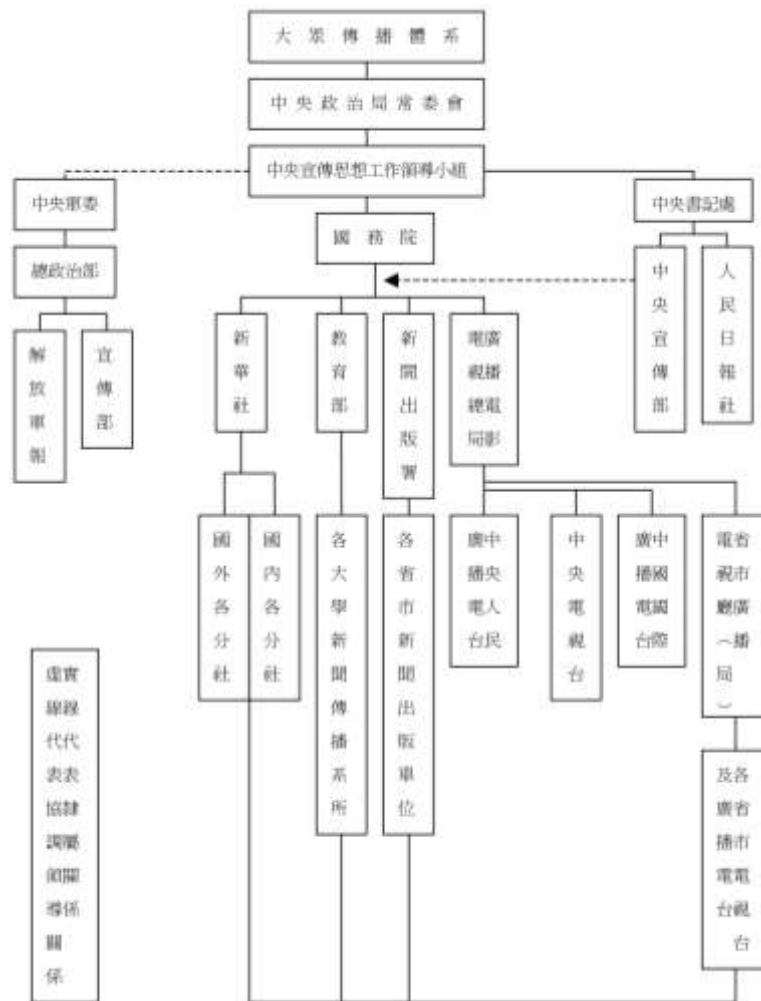
二、中共新聞媒體在軍事上的運用

揆諸中共歷史，軍隊始終是其政權結構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也就基於軍隊力量足以主導中共政權興衰，歷來其各領導人對此，均至表重視，唯恐軍權旁落，危及其在共黨中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即曾明白表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毛澤東，1958）。事實上，即便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已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時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解放軍報》，2003/8/2；《解放軍報》，2000/11/5）。在在說明中共軍隊必須完全服從共黨的領導。

基於要貫徹共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除了在組織架構上嚴密控制外，並且特別著重於軍隊的思想控制；鄧小平承襲毛澤東的觀點在《軍隊要整頓》一文中，明白指出：「我們這個軍隊有好傳統。從井岡山起，毛澤東同志就為我軍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樹立了非常好的作風。我們這個軍隊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楊永斌主編，1993：195）；而於1980年1月所發表的《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一文中，則進一步表示，「要堅決聽黨的話，堅信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一切服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這是我軍建設的根本原則，也是每個共產黨員黨性的最高表現。黨是我軍的締造者，我軍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我軍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必須聽黨的話，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楊永斌主編，1993：196）。即便時至今日，中共仍特別強調，要「提高各級黨組織從思想上、政治上掌握部隊的能力。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首先是思想政治上的領導。思想政治上的領導，從根本上決定著軍隊的政治性質和政治方向」（符文，2003/2/20）。無怪乎，長久以來，共軍一直將政治工作視為「是人民軍隊的生命線」、「是軍隊戰鬥力的重要泉源」，甚至引以自豪為「是共軍獨特的優勢」（江永多、王勇，2002）。

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亦明白表示，「把思想建設擺在全軍各項建設的首位，根本目的就是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符文，2003/2/20）；這一切除凸顯出中共對其軍隊思想控制的重視外，並彰顯出共軍將思想政治工作視為一切工作的核心。

不過，其對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遂行，中共卻相當倚重新聞傳播媒體。至於向來視新聞媒體為喉舌，重視宣傳的中共，對於軍事方面的宣傳自然更是重視，此可由中共從中央、省、市、地縣到鄉鎮，每一級都設有宣傳部，軍隊、學校、工廠、農村都有宣傳部、科、組，且每一個單位並配備有專職的宣傳報導幹部（至於實際運作關係，如圖一）。基於此，亦足以說明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就是通過這樣巨大且又嚴密的宣傳網絡，為共黨控制輿論，進而控制人民的思想。



圖一 中共大眾傳播體系圖

資料來源：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2003）。《中國大陸綜覽》。台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頁115。

綜合以上所述，關於中共新聞媒體在軍事上的運用，多著重於軍事宣傳與心戰、官兵思想政治教育，故而從這二方面作說明：

（一）軍事宣傳與心戰

誠如前述，中共基於共產革命之經驗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下，堅信：「建立政權和鞏固政權靠的是兩桿子：一是槍桿子，一是筆桿子（主要為宣傳媒介）」。¹無怪乎，毛澤東一再強調：「工農革命軍是戰士，也是宣傳員」，周恩來亦指出：「我們與其他軍隊最大不同點，就是我們軍隊內部的政治宣傳」（盛沛林主編，2000：87）。故而中共建政以來不但嚴密控制新聞媒體，並重視傳媒的內容及其明顯的煽動和組織作用。

所謂軍事宣傳，是泛指一切有關軍事常識、戰略、戰爭形勢的宣傳（劉建明，1992：56）。然檢視中共的軍事宣傳活動，它是將其主要內容規範為「關於軍事鬥爭（戰爭是軍事鬥爭的最高形式）和武裝力量建設的思想觀念」；將其主要作用規範為「直接為武裝力量建設服務，為全民國防教育服務，為戰爭準備服務，為奪取戰爭的勝利服務」；至於軍事宣傳的對象，則非常廣泛，「既有武裝力量成員，也包括非武裝力量成員；既有本方成員，也有敵方和中立方的成員」（盛沛林主編，2000：83）。

因此，中共當前是將軍事宣傳界定為：是宣傳者運用各種手段來影響宣傳對象的思想和行為的軍事觀念傳播（盛沛林主編，2000：84）。

誠如前述，中共將軍事宣傳對象，設定的十分廣泛，「既有武裝力量成員，也包括非武裝力量成員；既有本方成員，也有敵方和中立方的成員」，易言之，其軍事宣傳也涵蓋心理戰，對此，中共亦坦承，「軍事宣傳被軍事專家們當作心理戰的一個重要手段。心理戰就是征服人心的戰爭，它通過多種手段刺激和影響人的心理，造成有利於己，不利於敵的心理狀態，是用小的代價換取大的勝利，或不戰而勝的一種特殊作戰方式」中共甚至還強調：「宣傳是心理戰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包括一切經過周密計畫的手段，以形成、操縱和改變宣傳對象的觀點，使之直接或間接地有利於宣傳者」（盛沛林主編，2000：89）。

綜合以上可知，中共新聞傳播媒體在軍事上的運用，不單是對內作軍事宣傳，做全民國防教育，以鞏固心防，對外並以其他國家軍民為對象，進行心戰，期以操縱和改變宣傳對象的觀點。

（二）官兵思想政治教育

論及共軍官兵思想教育，始終被中共視為軍隊建設的首要，是軍隊思想建設的基礎；關於此思想教育的內涵，基本上即「堅持用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教育來激勵部隊，啟發和提高幹部戰士的政治覺悟，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提高認識世界的能力，並把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變為幹

部戰士的思想武器和自覺行動，保證黨的各項任務的完成」所謂共黨的意識型態及其方針、政策（楊永斌主編，1993：145）。對於此，毛澤東早就明確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毛澤東，1958：1094）。而鄧小平亦要求共軍「全軍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聽黨的話，服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這是我軍領導制度中必須貫徹的最高原則」（王法安、王高計，1995：70）。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亦明白指出：「要保證共軍永遠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關鍵在於選好幹部，造就一大批可靠的接班人。…，要十分重視在政治上嚴格把關，…，以領導幹部政治上的忠誠可靠，保證部隊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符文，2003/2/20）。江澤民於1990年並提出軍隊建設「五句話」的總要求，茲將之臚列如下（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2003：143）：

- 一、政治合格：軍隊要始終保持政治上的堅定性和思想道德純潔性。
- 二、軍隊過硬：軍隊要不斷提高戰鬥力、履行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使命。
- 三、作風優良：軍隊要始終保持共軍優良傳統和作風。
- 四、紀律嚴明：要嚴格遵守紀律、條令條例和規章制度。
- 五、保障有力：為軍隊建設和奪取軍事鬥爭勝利提供強有力的物質基礎和保障。

其中，第一項就是政治合格，要求軍隊要始終保持政治上的堅定性和思想道德純潔性。這一切除突顯出中共對其軍隊思想控制的重視外，並彰顯出共黨始終將官兵思想政治工作視為一切工作的核心。

事實上，中共新修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更將此列為首要。此由中共中央軍委的機關報——《解放軍報》亦強調，「修訂後的條例具有鮮明的特點：一是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進條例，…，並成為我軍現代化建設中的指導地位。二是將思想政治建設擺在全軍各項建設的首位。…。三是堅持與時俱進，對全軍軍隊開展政治工作」（《解放軍報》，2003/12/15）。這也說明即便面對世界軍事事務革命的新形勢，中國大陸亦積極推動其所謂的「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但在堅持共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之前提下，對共軍官兵思想政治工作仍視為一切工作的核心。

惟其對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遂行，中共卻相當倚重新聞傳播媒體，除了《人民日報》之外，直屬於共軍總政治部，為中共軍方的主要喉舌——《解放軍報》（下轄《中國國防報》、《中國民兵》、《軍事記者》、《環球軍事》、《解放軍畫報》及長征出版社），自然是共軍思想政治工作遂行之重要一環（陳中吉，2002；

徐瑜等，2003）。因此，中共軍方新聞媒體的主要任務，即對共軍官兵作思想政治教育，這是毫無疑義的。

參、中共新聞政策與軍事事務變革

新聞傳播體制是指一個國家的新聞傳播事業的總體結構以及國家對新聞傳播事業和新聞傳播活動進行協調和管理的體制。新聞政策則是在相應的新聞體制下對新聞傳播媒體進行協調管理的具體辦法和措施。在中國大陸的共黨一黨專政之下，現行大陸的新聞體制是由中共直接控制並為其服務的一種體制，而傳播活動的目的以及達到這個目的中共所制訂的政策，則是由中共不斷根據其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制定出一系列有關的新聞政策和工作原則，以對媒體和傳播活動進行管理和控制。在中共如此新聞體制及政策的制約下，新聞媒體直接代表政治權力說話，政治權力的意志就是新聞媒體的意志，而新聞媒體則成為政治權力的代表（何川，1994：165）。換言之，中共軍事事務變革是當前其新聞媒體的宣傳重點，自是不言而喻的。以下分別就這幾個面向來作探討。

一、中共新聞傳播體制與軍事新聞政策

（一）中共新聞傳播體制及其軍事新聞媒體

一個國家的新聞傳播體制總是同那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說，有甚麼樣的政治制度，就會有甚麼樣的新聞體制。新聞傳播體制所包含的國家和政黨同新聞傳播事業的關係，新聞傳播媒體歸誰所有，甚至傳播機構的經營管理方式等因素，都決定於政治制度（何川，199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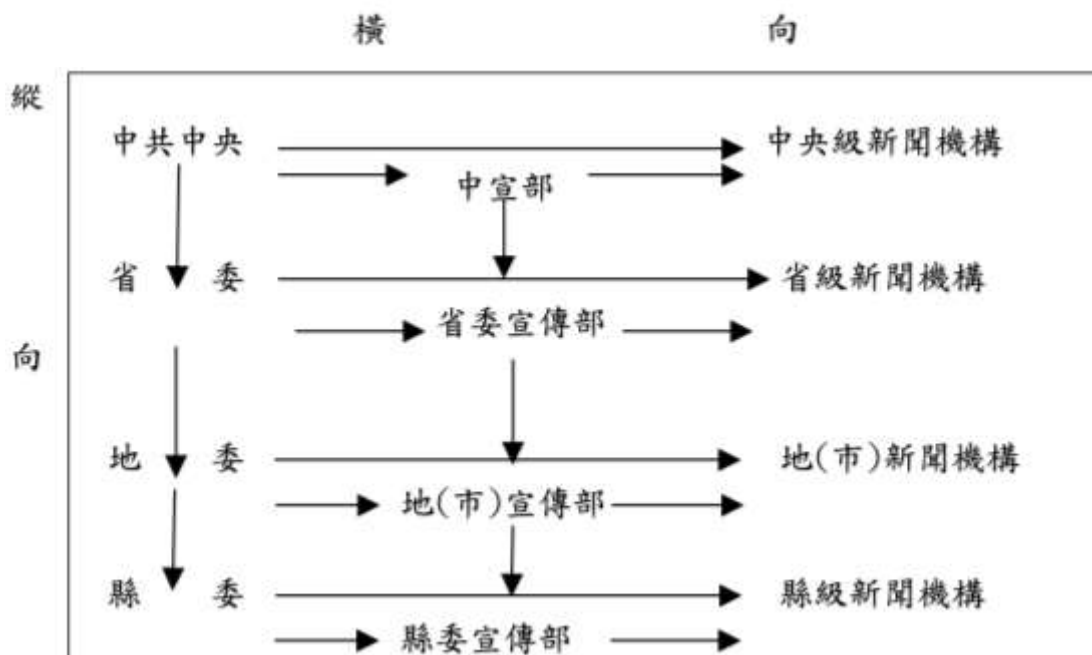
檢視當前各國新聞事業之狀況，雖說各有其不同的媒介控制法，學者將之分成 1.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制度；2.威權獨裁（authoritarianism）制度；3.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制度；4.蘇維埃/共產（Soviet totalitarianism/communist）制度等四種（林東泰，1999；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編，1999）。然就政治制度的角度來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有兩種：其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新聞體制；其二，昔日是蘇聯為代表，當蘇聯解體後，現則以中共為代表的極權主義新聞體制（Defeur, Melvin, 1970; Mcquail, Denis, 1987; Chang, Won Ho, 1989）。

中國大陸現行的新聞體制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基礎之上的（Howkins, John, 1982）。這種制度，在政治上實行的是專制和獨裁。檢視中國共產黨極權政權的建立及其統治的延續，所依恃的，就誠如中共自己所言的，一是

槍桿子，二是筆桿子。具體而言，即中共一方面通過所掌控的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實行暴力統治；而另一方面則利用他所控制的新聞、出版等機構，灌輸共黨的意識型態，以達到效忠極權政治的目的。也就是說，人民不但不可能像自由主義新聞體制般利用新聞傳播媒體對中共實行監督和制衡，甚至連自由表達思想、言論和獲取訊息的自由都沒有。

中共利用其所控制的新聞傳播媒體，將自己的一套政治規範、馬克斯主義的價值觀和政治認同灌輸到中國大陸每一個人的思想中，進而內化為行為取向共產主義的政治性格。換言之，在中共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下，其新聞傳播媒體完全淪為一黨專政的工具。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大陸所有的報紙、電台、電視台、通訊社等大眾新聞傳播媒體，都在中共的統一領導之下，通過共黨的各級宣傳部門的協調管理和其各級黨委對同級新聞機構的直接領導（關於其間之等級結構，如圖二），並由不同時期新聞政策的引導來進行運作（何川，1994：35）。

在如此的新聞體制下，中國大陸所有的報紙、電台、電視台、通訊社等大眾新聞傳播媒體，發表的言論一樣，無怪乎，乃有「千報一面」、「輿論一律」之稱（徐蕙萍，1989）。所不同的只是各自報導的領域不同，各自使用的傳播方式不同而已。



圖二 中共新聞體制等級結構圖

資料來源：何川（1994），《中共新聞制度剖析》，台北：正中書局，頁 91。

然審視當前的中國大陸報業等傳播媒體，即便經改已令其有不少的變化，如傳播媒體的形式由單一的報紙向廣播、電視等多種形式發展，傳播的內容也根據政治形勢的要求經常變化，但是，由中共統一領導、步調一致的新聞體制特徵，卻未曾改變。原因是在中國大陸的新聞處理上，有一行之已久卻不成文的規定，即凡在新聞報導中涉及到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都必須以新華社的「通稿」和《人民日報》的社論為標準，其他媒體不得發表任何意見，即使「報喜」的新聞，其措辭和用語也要和這兩家媒體統一口徑，不許標新立異（何川，1994：108）。

至於為中共文宣系統之一環的軍事新聞傳播媒體，當然更是如此，只不過在新聞報導中，凡涉及到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是以新華社的「通稿」和《人民日報》的社論為標準，至於軍事方面的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則以《解放軍報》為標準。因為，《解放軍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為共軍的主要喉舌；事實上，自文革以來，《解放軍報》即成為控制中國大陸的輿論導向之所謂的「兩報一刊」中之其一³，亦說明《解放軍報》在共軍思想政治工作中，確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二）中共的軍事新聞政策

所謂新聞政策，乃政策支配或輔導新聞事業的行政計畫；它的釐定完全係根據一國之立國精神與最高指導原則而來（李瞻，1975：1）。

顧名思義，為國家新聞政策一環的軍事新聞政策，即在維護國家安全與國防利益為前提下，配合政府政策與國防施政為原則，以達成軍隊建軍使命與現階段軍事任務為目標（胡光夏，2001）。

論及中共新聞政策的制定，它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意識型態領導小組來制定，這個小組的負責人一般都是共黨的最高領導。例如毛澤東之後，在 80 年代由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負責，後由江澤民接任，目前則由任總書記的胡錦濤負責（何川，1994：44）。中共的新聞傳播政策是堅持社會主義傳播政策，具有四項特質（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2003：115）：

1. 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傳播工作的指導準則，傳播事業必須無條件的接受黨的領導。
2. 傳播事業既是黨的宣傳工具，又是人民的耳目喉舌。
3. 傳播工作要依靠全黨及全體人民來辦，且堅持群眾路線。

³ 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兩報一刊」為名發表的社論，控制全中國大陸的輿論導向，所謂「兩報一刊」的排列次序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何川，1994：209）。

4.傳播工作以維持黨和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

中共之新聞傳播政策因此並衍生出五項任務（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2003：115）：

- 1.向人民群眾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
- 2.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國家法律、法令，以指導人民的思想與工作。
- 3.批評、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工作人員，幫助其糾正官僚主義和各種不正之風。
- 4.成為黨和人民群眾聯繫的橋樑。
- 5.做好對外報導和國際宣傳，增進國際間交流。

由中共新聞傳播政策之制定及其特質與任務可知，其軍事新聞政策的制定，是依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意識型態領導小組所制定的政策，然後由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在維護其國家安全與國防利益為前提下，以達成其現階段的軍事任務為目標的宣傳政策。就中共現階段的軍事任務而言，其是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下，達成下列四項要求（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2003：143）：

- 1.解決新時期共軍建設的主要矛盾：矛盾來自於共軍現代化水準與現代戰爭的要求不相適應，共軍要在武器裝備、情報偵察、通訊聯絡、指揮控制、聯合作戰、後勤保障等基本面，進一步調整改革，才能滿足打贏現代高技術局部戰爭的要求。
- 2.適應世界新軍事革命和打贏現代戰爭的迫切需要：現代全縱深戰爭形態、非線性作戰樣式與武器裝備，均已呈現資訊化趨勢，共軍則以科技強軍戰略，推動軍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策略，以求能因應世界新軍事革命之需。
- 3.作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建設總任務的需要：以國防作為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後盾，以因應世界多極化曲折發展與反霸鬥爭、西方軍事干涉、局部戰爭等的需要。
- 4.作為共軍向高級階段發展的必由之路：共軍以機械化為基本特徵的軍隊現代化任務尚未完成，卻又面臨資訊化戰爭的挑戰，資訊化建設將成為共軍向高級階段發展的必由之路。

其中，適應世界新軍事革命和打贏現代戰爭的迫切需要，尤為共軍現階段的軍事任務，此由中共前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一再強調，「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正在深刻改變著世界的社會經濟面貌，也正在深刻改變著軍事鬥爭的面貌，引發了軍事領域一系列革命性變化」（張振華主編，1998：58）。而中共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張萬年亦指出，「當代世界軍事領域的深刻變革，會對世界軍事形勢的

發展，乃至戰略格局的演變，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張萬年，1999：56）；《解放軍報》於社論中，亦一再強調，「積極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就要適應世界新軍事變革的要求，…我們搞的軍事變革，既要與世界接軌，又要有中國特色」，甚至進一步強調，「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關鍵在人才。下大氣力抓好人才戰略工程，是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推進這一變革的重要保證」（《解放軍報》，2003/4/25；徐瑜等，2003）。按照中共一貫的宣傳策略，此成為其當前的軍事新聞宣傳重心，自是不言而喻的。

二、中共軍方新聞媒體與軍事事務變革

誠如前述，在中共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下，其新聞傳播媒體完全淪為一黨專政的工具。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大陸所有的報紙、電台、電視台、通訊社等大眾新聞傳播媒體，都在中共的統一領導之下，由不同時期新聞政策的引導來進行運作。但也造成其所有的新聞媒體發表的言論一樣，遂有「千報一面」、「輿論一律」之稱。為中共文宣系統之一環的軍事新聞傳播媒體，當然亦不例外。就中共軍方新聞媒體而言，除隸屬於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解放軍報》外，主要的報刊有《中國國防報》、《中國民兵》、《中國空軍》、《當代海軍》、《軍事記者》、《環球軍事》、《解放軍畫報》、《中國武警》、《政工導刊》、《人民前線》、《東海民兵》…等等⁴。這些屬於中共軍方的新聞傳播媒體，其報導的重心，除環繞在其各自的發行宗旨外，關於軍隊的思想、道德與文化建設等被視為軍隊意識型態領域方面，則以《解放軍報》所報導的為標準作報導。

誠如前述，中共軍事新聞政策的制定，是依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意識型態領導小組所制定的政策，然後由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在維護其國家安全與國防利益為前提下，以達成其現階段的軍事任務為目標的宣傳政策。其宣傳重心，除要求軍隊要始終保持政治上的堅定性和思想道德純潔性等官兵思想政治工作外；就中共現階段的軍事任務而言，「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為其當前的首要之務，自然為其現階段的軍事新聞的另一宣傳重心，依照中共一貫的宣傳策略與作法，這些屬於中共軍方的新聞傳播媒體，所報導的自然皆環繞於此。

⁴ 中共軍方新聞媒體資料之蒐集，殊屬不易，原因是共軍是極封閉的一個團體，凡事都要接受極嚴格的保密要求。在這一部份採取拼圖的方式，資料之蒐集，經過綜合研判、比對，目前仍在繼續進行中。

肆、中共媒體在其軍事事務變革中扮演的角色與作用

（一）是共黨在軍隊的喉舌與集體組織者

中共冀望其軍方新聞傳播媒體首要扮演的角色與作用，是共黨在軍隊的喉舌與集體的組織者。基本上，就猶如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所指出的：「要保證共軍永遠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關鍵在於選好幹部，造就一大批可靠的接班人。…，要十分重視在政治上嚴格把關，…，以領導幹部政治上的忠誠可靠，保證部隊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符文，2003/2/20）。江澤民於1990年並提出軍隊建設「五句話」的總要求，其中，第一項就是政治合格，要求軍隊要始終保持政治上的堅定性和思想道德純潔性。這彰顯出共黨始終將官兵思想政治工作視為一切的核心；無怪乎，值此軍事事務變革階段，共軍的新聞傳播媒體仍強調「要正確發揮軍事新聞的指導性，必須強化喉舌意識、大局意識、全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嚴格按照軍事新聞的規律，注意通過真實、新鮮、有重要新聞價值的軍事事實，傳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軍委、總部的指示精神，傳播政治思想觀念」（盛沛林，2000：291）。

此亦說明在中國大陸軍事變革的現階段，中共冀望其軍方新聞傳播媒體「要保證共軍永遠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故其扮演的角色與作用，仍是共黨在軍隊的喉舌與集體的組織者的角色。

（二）推進中國大陸軍事變革核心工程的鼓吹者

國家之強弱，繫於人才的多寡；軍隊的強弱，則在於其官兵素質的高低。特別是面對新軍事革命的浪潮，共軍要實現「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轉變，實現其跨越性的發展，關鍵之所在，就是如何正確的運用其人才發展戰略。基於此，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全軍實施人才戰略工程加速人才培育座談會》中，特別指出：「人才是治軍強軍之本，…。伊拉克戰爭再次證明，在高技術條件下，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仍然是人的素質。全軍各級黨委和領導要切實把人才建設擺到戰略位置，…，為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為確保打的贏、不變質，努力培育和造就大批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開創良好的局面」（《解放軍報》，2003/6/7）。而中共另一軍委副主席郭伯雄也強調，「推進人才戰略工程，加強全軍人才隊伍建設，是新形勢下各級黨委肩負的一項重要任務，全軍各級黨委和領導一定要有戰略意識、戰略眼光，切實把人才隊伍建設擺上重要議事日程，實施強有力的組織和領導」（《解放軍報》，2003/6/7）。人才培育已成為中共軍事事務變革的核心工程（吳恆宇，2004：78）。

誠如前述，人才培育既已成為中共軍事事務變革的核心工程，勢必也成為它

最迫切的战略任务；在中共传播媒体的党性原则、舆论导向的灌输性及正面宣传的原则下，其军方新闻传播媒体自然是不断地报导（自 2003 年 6 月 4 日召开《全军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加速人才培养座谈会》后，至 7 月 17 日的一个月期间，《解放军报》就先后刊出五篇系列论述的「评论员」文章，其篇名分别是：〈人才建设推动战斗力提升〉、〈提高人才培养起点〉、〈拓宽培育渠道〉、〈注重机制创新、完善政策制度〉、〈两个课堂缺一不可〉）。而共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以〈造就驾驭信息化战争新型军事人才〉为题，强调「实现我军建设和发展的宏伟战略目标，最关键的是要大力培育适应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新型军事人才」（《人民日报》，2003/8/4）。由此足以说明，在中国大陆军事变革的现阶段，人才培养为中共军事事务变革的核心工程。中共冀望其军方新闻传播媒体扮演的角色与作用，是鼓吹者的角色。

（三）信息战争中的新作战样式

何谓信息战？论及信息战，必须追溯自传播媒体对战争的影响及其关系。人类自有战争以来，传播媒体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就始终伴随著战争。回顾人类社会数千年来时代的变革、战争形态的演变，不难发现，传播媒体的组织形式、层次结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等都是随著社会的演变而演变、发展而发展，传媒已由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传播方式，发展到广播、电视、卫星通信、网络等电子传播阶段，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就可把所要传达的信息有效地传到世界各国，具有非常强大的渗透力。

在进入 20 世纪以来，传播媒体非但具有强大的渗透力，並因其高度的大眾可信度，使其具有卓越的攻击力，大大增强心理战的效果。传播既可以宣扬战争的正义性，也能够彻底揭露战争的非正义性；既可欺敌，亦可瓦解对手的斗志。在战争时期，是最好的心战利器。致使传媒逐渐演变成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替代武器”。特别是经过波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后，传媒在战争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甚至可以說，要赢得一场战争的完全胜利，首先是传媒打击的胜利，其次是军事打击，亦不为过。在这两场战争中，首先进行大规模的宣傳攻势，如此，不但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与赞同，使敌对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进而采取多种措施打击其传媒设施，力图实现新闻封锁，以打垮它的抵抗斗志，最后彻底摧毁其精神防线，在这同时，並以精確打击的高技术武器系统攻击之，让对方毫无招架能力。

再者，当网络成为信息时代的主要传播工具，网络战也将成为 21 世纪战争的主要样式之一；所谓网络战，是在危机或战争中，用电脑网络进攻与防禦技术，摧毁对方的网络系统，使其不能发挥作用，同时保护己方网络的正常快速运转，发挥信息系统的作用。网络战的破坏力是相当大的，它可使大规模网络系统瞬间

癱瘓或毀滅，將對方指揮、通信、媒體、電力、交通、金融、航天、航空等各各方面造成嚴重破壞。一場網絡戰將是一場全新的不流血、不傷亡的戰爭。它將不分國界、地區、不分種族、觀點，一個人一台電腦就是一個作戰單元，每個人都可以代表交戰的一方參加戰爭（沈偉光，2000：4；沈偉光主編，2005：89）。

有鑑於此，中共於1985年開始對信息戰展開概念與理論的研究（沈偉光，2000：66）。所謂信息戰，美軍是稱之為信息作戰，將之定義為：在軍事信息環境中的連續軍事行動，實現、增強、保護指揮官的決策和任務執行，從而獲得軍事行動全範圍的信息優勢。至於中共在其《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中的定義是：敵對雙方在信息領域的對抗活動。主要是通過爭奪信息資源、掌握信息的生產、傳達、處理等的主動權，破壞敵方的信息傳輸，為遏止或打贏戰爭創造有力的條件（沈偉光，2000：68）。信息戰的表現形式很多，心理戰、情報戰、戰略競爭、實力威懾、潛力對抗、電子戰、用於摧毀信息設施的火力戰、電腦病毒戰、隱形戰、駭客戰、網絡戰等等，由此開闢了在“看不見的空間”展開的第五維戰場（沈偉光，2000：67）。

誠如中共軍事戰略學者沈偉光所言，「傳媒，是一個國家的喉舌。沒有傳媒，國家就沒有喉舌，沒有言論。…。經過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後，給人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在戰爭中保護好國家的傳媒機構是多麼的重要。」（沈偉光，2000：3）。中共非但對傳媒管制更加嚴密，且積極進行媒體戰、輿論戰的研究。此由共軍在新修訂的《政工條例》中，明確提出政治工作「是構成軍隊戰鬥力的重要因素」，要組織開展「輿論戰」等內容，足見中共已經把「輿論戰」視為未來高技術戰爭中的重點工作，並認為「輿論戰」是一種相對獨立的政治作戰樣式（陳津萍，2005）。關於共軍對「輿論戰」之相關內容界定詮釋，如表一，至於其所設定之功能作用，則如表二。

審視共軍對「輿論戰」之相關內容界定及其所設定之功能作用，足以顯示，在中國大陸軍事變革的現階段，中共冀望其軍事新聞媒體，不單只是共黨在軍隊的喉舌與集體組織者的角色，還得扮演積極推進中國大陸軍事變革的鼓吹者的角色，甚至還得成為信息戰爭中的新作戰樣式——「輿論戰」、「媒體戰」、「網絡戰」、「心理戰」。

表一 共軍開展「輿論戰」相關內容界定

項次	項目	輿論戰相關內容
一	輿論戰的定義	輿論戰即在爭取國內外輿情的支持，透過傳媒對重大敏感問題進行導向性宣傳和評論的輿論對抗活動，是配合國家政治、外交、軍事鬥爭的重要形式，是發揮政治工作作戰功能的基本途徑，是在政治、精神領域的對抗活動。
二	輿論戰的內涵	把輿論戰做為一種特殊的作戰樣式，是資訊化戰爭的產物與要求。它是有計畫地向眾傳遞經過選擇的資訊和材料，阻斷、瓦解和反擊敵方的宣傳攻勢，從而影響受眾的情感、動機、主觀判斷和行為選擇，主導新聞輿論、影響民意歸屬，改變雙方整體力量對比。
三	輿論戰的重點與手段	掌握新聞輿論，在充分利用報紙、廣播電台、電視台的基礎上，綜合運用網路、電子郵件、移動電話等現代技術手段，形成立體宣傳，給對手強大的輿論壓力為重點。
四	輿論戰的特徵	1. 為實現一定的政治、軍事、經濟利益服務的。 2. 透過資訊作用於人的認知系統而實現作戰的功能。 3. 運行載體是大眾傳媒，具用公開性、輻射面的廣泛性、強滲透力、強負載力，以及高度的大眾可信程度，為輿論的展開提供了空前廣擴的平台。 4. 實現的基礎，以軍事實力為後盾，綜合國力為基礎，以高新技術裝備為依托。

資料來源：陳津萍（2005）。〈從二次波灣戰爭探討共軍「輿論戰」之發展與影響〉，國防雜誌第 20 卷第 2 期。

表二 共軍開展「輿論戰」之功能（作用）

項次	項目	輿論戰的功能（作用）
一	弘揚戰爭正義，爭取民眾的支援	現代戰爭，打的是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如果不能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不能是最廣泛地動員和發動人民群眾，在這場戰爭就難以取勝。人心向背地從來都是取得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在爭取人心問題上，交戰雙方無不通過輿論戰來贏得主動。
二	醜化對手，陷敵於不仁不義之地	從近幾場高技術局部戰爭來看，利用網路、報紙、電台、電視等各種現代傳播手段，對敵方領導人、政權和軍隊進行鋪天蓋地的「醜化」、「妖魔化」、「欺騙敵方」宣傳，讓其失去民眾支持、失去人心，在現代戰爭中，已成為一種戰略戰術。
三	激發己方鬥志，凝聚軍心民心。	在戰爭中製造、傳播、控制和及時發布鼓舞人心的戰地消息，樹立先進典型，介紹他們與敵人頑強戰鬥的精神，可激發己方的鬥志、增強士氣和凝聚力。因此，在現代高技術局部戰爭中，通過傳播、控制和引導輿論，能夠生成一種無形的戰鬥力。
四	削弱敵方士氣，分化瓦解敵軍	利用敵方內部矛盾瓦解敵軍，歷來都是輿論戰的重要功能。現代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輿論戰瓦解敵軍的效能更加明顯，使美軍基本上達到了不戰而勝的輿論戰目的。

資料來源：陳津萍（2005）。〈從二次波灣戰爭探討共軍「輿論戰」之發展與影響〉，國防雜誌第 20 卷第 2 期。

伍、結論

綜合上述可知，在進入 20 世紀以來，傳播媒體非但具有強大的滲透力，並因其高度的大眾可信度，使其具有卓越的攻擊力，大大增強心理戰的效果。傳播

非但可以宣揚戰爭的正義性，也能夠徹底揭露戰爭的非正義性；既可欺敵，亦可瓦解對手的鬥志。在戰爭時期，是最好的心戰利器。致使傳媒逐漸演變成戰爭中不可缺少的“替代武器”。再者，是當網絡成為信息時代的主要傳播工具，網絡戰也將成為 21 世紀戰爭的主要樣式之一；網絡戰的破壞力是相當大的，它可使大規模網絡系統瞬間癱瘓或毀滅，將對方指揮、通信、媒體、電力、交通、金融、航天、航空等各方面造成嚴重的破壞。一場網絡戰將是一場全新的不流血、不傷亡的戰爭。它將不分國界、地區、不分種族、觀點，一個人一台電腦就是一個作戰單元，每個人都可以代表交戰的一方參加戰爭。一向視新聞傳播媒體為共黨的喉舌、政治宣傳工具，並受到嚴密控制的中共，經過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後，更加體認到：傳媒在戰爭中無與倫比的重要角色；就誠如中共軍事戰略學者沈偉光所言，「傳媒，是一個國家的喉舌。沒有傳媒，國家就沒有喉舌，沒有言論。……。經過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後，給人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在戰爭中保護好國家的傳媒機構是多麼的重要。」（沈偉光，2000）。此種論點，除顯示中共對傳媒的管制將更加嚴密外，另外也點出中共何以要積極進行媒體戰、輿論戰研究的原委。此由共軍在新修訂的《政工條例》中，明確地提出政治工作「是構成軍隊戰鬥力的重要因素」，要組織開展「輿論戰」等內容，足見中共已經把「輿論戰」視為未來高技術戰爭中的重點工作。

故當中共積極展開軍事事務變革階段，中共冀望其軍方新聞傳播媒體「要保證共軍永遠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故其扮演的角色與作用，首則是共黨在軍隊的喉舌與集體的組織者的角色。再者，人才培育已成為中共軍事事務變革的核心工程，勢必也成為它最迫切的戰略任務，中共軍方新聞傳播媒體還得扮演積極推進中國大陸軍事變革的鼓吹者的角色；特別是經過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後，讓中共體認到：傳媒逐漸演變成戰爭中不可缺少的“替代武器”，尤其當網絡成為信息時代的主要傳播工具，網絡戰也將成為 21 世紀戰爭的主要樣式之一後，致使中共軍方新聞傳播媒體還得積極成為信息戰爭中的新作戰樣式——「輿論戰」、「媒體戰」、「網絡戰」、「心理戰」。

參考書目

(一) 中文部分

- 毛澤東（1958）。《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90）。〈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
- 王法安、王高計（1995）。《鄧小平軍隊制度建設思想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江澤民（1990）。〈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幾個問題〉，《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
- 江永多、王勇（2002）。《WTO與軍隊政治工作》。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編（1999）。《傳播與社會》。台北：揚智。
- 沈偉光（2000）。《傳媒與戰爭》。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沈偉光主編（2005）。《中國信息戰》。北京：新華出版社。
- 何舟（1993）。〈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 何川（1994）。《中共新聞制度剖析》。台北：正中書局。
- 李瞻（1975）。《我國新聞政策》。台北：新聞記者公會。
- 李瑞環（1990）。〈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
- 金鑫、徐曉萍（2002）。《中國問題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吳恆宇（2004）。《中共新軍事革命人才培育與院校教育改革》。台北：大屯出版社。
- 林東泰（1999）。《大眾傳播學理論》。台北：師大書苑。
- 胡耀邦（1985）。〈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中國新聞年鑑》。北京：中國新聞年鑑社。
- 胡耀邦（1990）。〈關於黨的新聞工作〉，《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
- 胡光夏（2001）。〈軍事發言人角色之研究—以國軍軍事發言人室為例〉，《軍事社會科學研究專輯》。台北：政治作戰學校。
- 邵培仁、陳兵（2003）。《媒介戰略管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徐瑜等（2003）。〈從媒體輿論導向看共軍當前思想政治工作之趨向—以中共《解

- 放軍報》報導內容為例》，《軍事社會科學研究專輯》。台北：政治作戰學校。
- 徐蕙萍（1989）。《中共「新聞改革」之研究—以中共的報紙為主》。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蕙萍（2004）。〈中國大陸體制下報業集團化之析探〉，《復興崗學報》。台北：政治作戰學校。
-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2003）。《中國大陸綜覽》。台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
- 張多馬（1995）。《大陸新聞業概況》。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 張振華主編（1998）。《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關於軍隊建設的理論貢獻》。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張萬年（1999）。《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陳力丹（1999）。《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陳中吉（2002）。《中共〈解放軍報〉揭批「法輪功」之內容分析》。政治作戰學校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津萍（2005）。〈從二次波灣戰爭探討共軍「輿論戰」之發展與影響〉，國防雜誌第20卷第2期。
- 符文（2003）。〈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解放軍報》，2003/2/20。
- 盛沛林主編（2000）。《軍事新聞學概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楊永斌主編（1993）。《毛澤東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劉建明（1992）。《宣傳輿論學大辭典》。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
- 《求是》半月刊，1998/3。
- 《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11/30，第一版。
- 《人民日報》，1996/9/27，第一版。
- 《人民日報》，2003/8/4，第十版。
- 《解放軍報》，2000/11/5，第一版。
- 《解放軍報》，2003/4/25，第一版。
- 《解放軍報》，2003/6/7，第一版。
- 《解放軍報》，2003/8/2，第一版。
- 《解放軍報》，2003/12/15，第一版。

（二）西文部分

Chang, Won Ho (1989) *Mass Media in China: 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Ames: I

徐蕙萍

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Defeur,Melvin, (1970) .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 David McKay.

Howkins,John (1982) *Mass Communication in China*. N.Y.:Longman .

Mcquail,Denis, (1987)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CA:Sage.

(投稿日期：94 年 8 月 2 日；採用日期：94 年 11 月 14 日)

中共新聞媒體在軍事事務變革中扮演的角色與作用